

· 百 家 园 ·

中医情志相胜疗法基本理论及优势

中医情志疗法源远流长,经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和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发展,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中医情志疗法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尤具特色的是情志相胜疗法。现将情志相胜疗法的基本理论与优势探讨如下。

1 情志相胜疗法的基本理论

情志相胜疗法就是医生有意识地激起患者一种暂时的情志,去战胜、制止、克服另一种偏激的情志,使机体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情志相胜疗法主要包括“阴阳相胜疗法”、“五行相胜疗法”及“气机互调疗法”三种。

1.1 阴阳相胜疗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灵枢·行针》亦云:“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从而赋予情志不同的阴阳属性。吴昆《医方考·情志门第二十七》有:“经曰:思者气结。气结者,阴翳之根也,故用暴怒以伤其阴,使之归于平调而已。”认为思为脾志属阴,气结而不畅亦属阴,故以属阳之怒来抑制其过胜之阴,使之恢复平衡。

1.2 五行相胜疗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与《素问·五运行大论》均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至此,中国古代情志相胜疗法及其理论之雏形基本形成。金元医家张子和对此法十分推崇,其《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云:“悲可以治怒,以恻怆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褒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然而,以情胜情疗法,并不是简单机械、千篇一律的按图照搬,如余瀛鳌先生在《情志疾患的五志相胜治法》一文中曾说:“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理论来看,是以五行生克作为立论基础的,但也不能拘执此说,如上述忧胜喜、悲胜喜、喜胜怒、恐胜忧等,若单一五行相克的理论是难以解释的。五志相胜实际上是一种整体调整气机的疗法,人们只要掌握情志对气机运行的影响,即可采用此法。”

1.3 气机互调疗法

《素问·举痛论》论“九气为病”,认为不同情志所致气机变化不同,即所谓“怒则气上,喜则气缓”等,开创了从气机角度认识情志作用机制的先河。张从正在《儒门事亲·卷七·内伤形》中曰:“夫惊者,神上越也,从下击几,使之下视,所以收神也,一二日虽闻雷而不惊。”即以神气上越者使之气机下行而论。吴昆《医方考·情志门第二十七》云:“盖悲思则气结,惊怖则气浮,浮则气不结矣。此亦以情相胜也。”明确提出不同的气机变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并作为情志相胜的机制。

2 情志疗法的优势

情志相胜疗法的现代运用明显减少,但它具有自己独特的

优势,应该引起重视。

2.1 中国古代情志相胜疗法虽然治疗方法简单,但设计相当精妙,疗效明显。这也是它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在古代流传数千年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它是在患者特定的生活条件和范围之内进行的简单而又构思精巧的治疗设计。大部分治疗都是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可以充分调动患者的情志变化,而且整个治疗也显得自然真实。

2.2 中医情志相胜疗法十分注重个体的差异性

中医情志相胜疗法不仅把人的情志分成五种状态,并根据不同的情志特点提出了五个基本程序,而且其个体差异性的特点还表现在针对相同的症状时,古代医家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比如,同样是采取“怒胜思”的疗法,《吕氏春秋》中文挚治疗闵王时就是用“不解衣履登王床,履王衣,口出陋词”来激怒闵王。而《续名医类案》中治一富家妇人的思虑之疾就是“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法而去”的方法激怒患者。这说明,古代医家在进行心理治疗时深谙患者的社会地位、贵贱贫穷、个性差异等,根据各自的特点辨证施治。

2.3 注重治疗的整体性

其表现的主要方面就是重视整体调整,在心理治疗中注意到神对形的反作用,主张形神兼治,通过治神而治愈形体的疾病。治疗的整体性,还表现在综合性的治疗措施上,在治疗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患者所处的环境、地位、人际关系、疾病起源,同时也考虑到患者对医者的信任度以及个性特征,与治疗者配合的程度等等,把医患都纳入其中,将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看待。古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掌握和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心理治疗方法。这些方法以治病为最终目的,正反结合,辨证论治,灵活运用,不拘一格,在治疗体系上没有西方的严格派别之分,但是以今之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来看,古代之方法契合今天各家流派之思想,且富有自己的原创性。

2.4 具有明显的古代中国本土特色

情志相胜疗法反映了古人特有的人生态度。此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在治疗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情志相胜疗法的理论基础——阴阳对立统一、五行制约观,是古人重辩证逻辑、轻形式逻辑思维特点的直接体现。另外,不论是情志的相生还是相克,都体现了古人克制、谨慎、自律、中庸的情感表达方式。太过的情绪和情感表达,被认为是病态的,健康的情绪情感状态应该是阴阳均平,治疗者的目的就是调适太过的情志,使之达到当时社会接受和认可的中庸状态。另外,古人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心理治疗方法中也有体现。

北京中医药大学2004级研究生(100029) 霍磊

北京中医药大学 翟双庆

建国前中医期刊内容概览

在整理200多种1949以前中医及相关期刊的基础上,收集到中医文献1万余篇。这些文献虽然远不是全部,但从其涉及的年代跨度及内容的广度而言,已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意义。以下

萃取部分文章,依照其内容略加归类,希望从中能窥见20世纪上半叶中医发展过程及具有时代特点的研究课题。

1 关于中医发展出路的探讨

近代的西医进入中国引起的冲击,促使所有关心中医的有识之士对中医的命运提出继承、挽救、发展的各种思路和办法。如杨志一在1927年发表的“改进中医之先决条件”;陆清洁1928年的“中医中药之前途”;秦伯未1928年发表的“怎样去改进中医学”和1935年发表的“医界前途之危险”;郑凤石1934年发表的“中国医药事业整理方略”;张赞臣1936年的“中医科学的改造”及谢诵穆的“中医往何处去?”;丁福保的“国医科学化之我见”;尤学周的“中医如何使用科学方法”;方药中1944年提出的“目前中医界的最大危机”;陆渊雷的“中医将取何途以改良”等等,都在这个专题上留下了令人感悟、发自肺腑的声音。这些涉及中医在现代如何发展的话题,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医史、讨论中医改革发展的重要文献。

2 中医求存抗争的历史画卷

近代中医期刊中许多文章为中医生存而奋斗呐喊。文章作者如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为今天的总结历史、探讨根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秦伯未1925年的“斥余云岫医校系统驳议案”;蒋壁山在1926年发表的“中西医学说抵触案之批判”;余云岫1929年的“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林畅荣的“对中医必亡说想起自强方法”;祝敬铭1936年撰文“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对待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之感想与希望;卢志坚的“中医必亡说之反响两封信”等文章都是这段历史的写照。这些满腔热情反对废止中医的宏文大作,使我们为前辈的奋斗精神而感动不已。近代中医能免除日本汉方医在明治维新覆亡的命运,应该归功于前辈学者当年的抗争。

3 中西汇通,与时俱进

西医东渐,使中医面临冲击,面临学术、市场的竞争,中医如何应对,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虞舜臣1926年的“中西医之比较”;王慎轩1926年的“中西医之评议”;张赞臣1926年的“中西医学之异同”;朱振声1926年的“西医根据中医学说之考证”;祝味菊在1927年的“中西医学论”;叶橘泉1928年的“中西医学立脚点之比较”;许半龙的“西医学家与中医古医书”;“中西医之比较观”;张锡纯的“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陆士谔的“斥慎君论中西医学”;陈存仁的“中西医与新旧”都是这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表达了当时中医对如何汲取西医之长,如何与时俱进的许多有益的主张。

4 医史文献资料整理

20世纪上半叶,是封建与新时代交替的关键时期。如何保存中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加以研究,是当时医药文献学家的重要任务。其中代表作有范行准的“栖芬室善本医书叙录”;章次公的“本草纲目拾遗引书编目”;谢诵墨(穆)的“中国历代医书伪书考”;“传染病文献的搜集”;裘吉生的“医学古籍序目纂要”等一批书目研究论文;还有如秦伯未的“张仲景的伟大贡献”;章太炎的“张仲景事迹考”;耿鉴庭的“鉴真和尚考”;黄竹斋的“关中历代名医传”;张锡君的“滑伯仁先生传”;叶劲秋的“外治之宗吴尚仙”;李涛的“药王庙与十大名医”等人物传记,以及曹

炳章1936年撰“中国历代伤寒书沿革”;李赋京的“中国五行学说之起源”;“中国解剖学源流论”;李涛的“北平医药风俗今昔谈”;“中国结核病史”;宋大仁的“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史”等等,这些论文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医史文献研究成果,也成为当代医史文献研究的基石。

5 近代中医教育的记录

在中医教育发展历史上,尽管曾有过官办医学校和少量私人医学馆,但中医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父传子、师带徒。近代以来,中医学校发展迅速,名正言顺地逐步成为中医教育的重要形式。这一进展尽管步履蹒跚,但却是中医在近代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中医教育发展的历程,近代中医相关期刊中也有许多相关的文章。如周小农在1923年就提议“各省宜建设中医学校扩充科目议”,在1925年又提出“中医宜设专校不宜附设西医校内”;黄竹斋1936年的“教材标准草案”;朱小南1939年提出的“中医教育之新展望”等,都是为不断完善中医教育所做的不懈努力,且为今天中医院校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6 生动活泼的医论医话

近代中医及相关期刊还出现了众多生动活泼的医论医话。不拘一格地对中医学学术各方面纵横议论,体现了中医的学术水平、个人经验、医史研究等内容。如承淡安的“针灸医话”;俞鉴泉的“绩学庐随笔”;高思潜的“医林杂话”;盛心如的“诊余偶谈”;谢观的“澄斋医话”;王吉民的“芸心医话”;刘民叔的“诊余读书记”;杨志一的“医学碎金录”;李健颐的“余庆轩随笔”;时逸人的“四友斋医话”;沈仲圭的“吴山散记”等。这些作品大都是期刊中的连载栏目,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没有留下合订本,收集其中的医话医论并结集出版,非常有学术价值。

7 丰富可靠的名医验案

当代许多名医验案大部分都是民国时期名老中医的作品,有些名老中医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活跃在临床第一线。这些名医验案涉及的病种很多,包括章太炎的疟论、霍乱论、肺炎病治法;章次公的“湿温医案选评”;“湿温症症”;“胃病医案选”;程门雪的“痢疾解”;虞舜臣的“嫩园新医案”;蔡陆仙的“痢论”、“中风概论”、王一仁的“仁龔医学”;王慎轩的妇科诸病治疗经验,尤学周的“吐血的原因及调治法”;邢锡波的“怀葛斋医案”;朱振声的“血症概论”、许半龙的“崇百药斋医案”;沈仲圭的“癫狂痫浅说”;张赞臣的“论烂喉痧病”等。这些医案对临床、教学、科研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8 医学科普

这类资料除了一般医学的普及教育、基层的防病治病等内容外,还有大量涉及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及治疗,包括霍乱、鼠疫、性病等的科普文章。代表性的论文有许半龙1935年发表的“国医乡村协作团”;张赞臣1935年发表的“医药到农村去”;祝敬铭1936年发表的“医药卫生普及农村的有效方法”;丁福保“节欲新法”、“传染病预防法”、“肺病的自然疗法及流弊”及宋大仁的“戒烟分速戒与缓戒”、“戒鸦片烟方”;张锡纯1927年的“治鼠疫之原因及治法”;张赞臣1947年在“社会卫生”上发表的“三十年来鼠疫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孙髯的“民国二十三年太仓流行性疫病之可怖”等,为了解近代的科普教育及时流行病的防疫与治疗保留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9 各类序文及文学创作

近代中医及相关期刊中,还保存了许多名家所写的书序,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一些医学名家对这些著作的评价。举其大者有“医医医病集序”、“萧评郭敬之医案序”、“内经类编序”、“黄竹斋先生针灸图考序”、“中国医学集成序”、“太炎先生论医集序”、“中国医学源流论序”、“霍乱通论序”、“温病新论序”等等。此外,近代医家许多是医、文兼通,诊余还撰写了许多医药文艺类的作品,如药名诗、长寿诗、卫生诗歌及秦伯未等的一些生活中的诗歌创作。这些艺术作品给后人带来知识和美的享受。虽然这些资料不是单纯的医学内容,但细细品味,仍是反映这个时代医学特征的重要佐证。

以上概述了1949年前中医及相关医学期刊中9大类文献的概况和代表作。此外还有大量有关药物、方剂、养生、各种杂纂、通讯、医学珍闻等多方面内容,无一不展现着近代与中医发展相关的方方面面。社会名流在具有时代特点的时刻所发表的各种演说、评论,也是重要的历史材料。如陈立夫、陈果夫曾有多次演讲稿,陈立夫在1934年所做的“医药之将来”、陈果夫1935年发表的“当前医者之责任”,以至蒋介石在1930年发表的“提倡中医乃自强之道”等文章,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献。因此,重视对1949年以前中医期刊的整理研究,对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100700) 王咪咪

评《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

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辑的《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先后出版了3辑,共47种(第一辑13种、第二辑14种、第三辑20种)。这些著作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所涉及到的著名老中医不仅医疗技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堪称后学的楷模。他们博览群书,精通经典,知识广博,学验俱丰,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医的学术水平和临床丰富的治疗经验。他们当中的代表如秦伯未、施今墨、蒲辅周等著名医家,既熟通旧学,又勤修新知;既提倡继承传统中医,又不排斥西医诊疗技术的应用,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批著作有的成于垂暮之年,有的甚至撰写于病榻前,无论是亲自撰述,还是口授,或是其弟子整理,都集中反映了他们毕生所学和临床经验之精华。诸位名老中医不吝秘术、广求传播,所秉承的正是力求为民除瘼的一片赤诚之心。他们治学严谨,厚积薄发,阐述经典,钩玄挈要,义理详明;所述医案,辨证明晰,治必效验,不仅具有很强的临床实用性,其中也不乏具有创造性的建树;医话著作则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为近世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

《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以临床医案为主。在所选医家中,既有近代名噪江浙的陈良夫、金子久、范文甫等,也有现代的著名医家秦伯未、施今墨、冉雪峰、蒲辅周、岳美中、张菊人、叶熙春、赵锡武、郭小舫、金寿山、关幼波、刘渡舟、赵绍琴、焦树德、李今庸、赵炳南、张赞臣、朱仁康、朱小南、钱伯煊、刘奉五、王伯岳、赵心波、韦文贵、刘寿山、陆瘦燕等,尤为引人注目

的是收选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章太炎医论》,其睿智宏论与严谨缜密的治学精神为中医学术界带来了新风。京城“四大名医”的代表医家施今墨在《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中提出的“十纲辨证”新观念,以及“施氏药对”的临证应用,弥足珍贵。现代肝病治疗专家关幼波在《关幼波临床经验选》中对肝病的辨治提出“瘀瘀血脉”的新见解。各家见仁见智,琳琅满目,各具千秋,不一一列举。在收选临床医案的同时,还收选了一些医论、医话、读书笔记等。

综观古往今来贤哲名医,均是熟谙经典、勤于临证、发遣古义、创立新说者。《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中也收选了著名医家秦伯未、刘渡舟、赵绍琴、谭日强等有关阐述中医经典著作方面的著述,其中有《内经类证》、《伤寒挈要》、《金匱要略简释》、《金匱要略浅述》、《温病纵横》。这些著作反映了这一代名医在阐发经典古义的同时,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古为今用,重在实效,用中创新,不仅在理论上阐释经典,而且结合经典予以辨析、指导应用,解决临床中的困难,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在这些著作中,无论是医案,还是医论、医话、读书笔记,蕴涵着他们精深独到的学术思想。《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涵盖了中医内、外、妇、儿、骨伤、针灸各科。秦伯未所著的《中医临证备要》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中医人员的案头书;《内经类证》把《内经》按病证分类,更加彰显《内经》的临床价值。蒲辅周《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其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辨证论治是中医继承与创新结合的典范,对有效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作出了贡献。其余各家临床医案、医论、医话、临床治疗经验等著作,覆盖内、外、妇、儿、针灸等各科,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所选医案,记录翔实,是从其众多的医案、临床笔记精选出来的;所选医论,见解独到,是他们多年积淀的升华,是所学所验的高度体现。有些医案备受后学推崇,在一些著作中多有收录和转载。

《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为我们继承名老中医经验,提高中医临床医疗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必须运用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以科学的方法获取最显著的临床疗效,以严谨的治学精神,诠释和求证名老中医的理论与经验,在继承之中求创新,在继承之中求发展。有继承,才有创新;有创新思维,才有创新成果。先贤先师为我们树立了融古推新的典范,为了中医的发展,为了把中医的学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必须端正学风,遵循中医继承与创新的规律,慎思之,笃行之。

由于原版书出版的时间已久,已很难见到,部分著作甚至已成为学习中医者的收藏珍品。在时隔50年后的今天,《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在我们殷殷的期盼中问世了,这是中医界的福音。此次汇集重刊,真可谓集当代“名医之精粹,经验之大成”,必将受到广大临床工作者的欢迎,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推动中医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民卫生出版社(100078) 张永泰

降血糖中草药有效成分浅析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为特点,以糖代谢紊乱为主要表现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中医药用于治疗糖尿